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述评

徐 玲

(郑州大学考古系 河南郑州 450001)

内容提要:近年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只是这类研究多限于单一学科,多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重点关注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关键词:近代中国 文物观念 变迁史 多学科 古物 近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1840—1949年的近110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变革最为明显的一个历史时段。文物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政治及学术话语,因此近代中国文化的急剧变革,引起各群体对文物话语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形成了不同的文物观念。尤其是受考古学、新史学等影响,文物在重塑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文物观念的变迁又影响了考古学、新史学及艺术史的学术路径。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深层次透视近代中国文化变革史提供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也无疑是近代考古学史、新史学及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纵观学界近年对此议题的研究,本文将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研究存在不足及重新研究构想三部分对之进行系统述评。

一 已有研究成果梳理

近年与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学术关联度从近至远依次分为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下面分而述之。

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及观点有:黄海烈的《古董与国粹:民国初年

国人的考古学观念》^[1]、查晓英的《保护“学问的原料”:由1923年新郑铜器发现所见中国考古学之萌芽》^[2],两文分别就民国初年国人古董意识的改变和文物变为学问原料的观念的产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均认为民国初年考古学的产生对传统文物观念冲击颇大;王恩田的《王献唐与新型金石学》一文提出,近代文物从私人玩赏之物一变而为开启民智的公共资源,是文物观念在近代中国经历的一次全新变革^[3];李飞的《由集新到集旧: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一个演进趋向》,以博物馆史研究为视角,梳理了文物在近代中国由被弃之物变为重构国家文化珍贵史料的历史脉络,认为近代中国国家文化重构的需要是引起文物观念变革的特殊因素^[4];吴淑瑛的《博物馆展览与国族、文化的想像——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1936)”为例的观察》,以近代出国展览活动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中国文物与国族、文化想像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时博物馆展览的文物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符号^[5];林伯欣的《“国宝”之旅:灾难记忆、帝国想像与故宫博物院》,考察了近代文物被重新化为“国宝”的过程,认为此与中华国族文化重构过程相一致^[6]。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的变迁还表现在对文物价值认知上的变化,代表性成果及观点有:巫鸿

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7]和美国学者珍妮特·埃利奥特(Jeannette S.Elliott)等的《中国皇家收藏传奇》^[8]两书,对文物作为中国传统王朝天命观和礼制秩序重要载体的价值、内涵,尤其是历代皇家收藏文物所蕴涵的政治意涵进行了探讨;徐婉玲的《记忆与认同:故宫博物院1925—1949》,以故宫博物院建院为中心,系统考察了由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围绕清室文物属性的争端,认为国人对文物价值的重新认知受博物馆公藏观念影响较大^[9];季剑青的《“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则考察了清室文物“国有化”的进程,认为近代国家话语和观念落实为博物馆这一制度性机构的实施过程是艰难的^[10];徐清的《清末民国时期关于“金石学”概念的三种阐释立场》,通过考察近代国人对“金石学”概念的不同阐释立场,即史学的、近代考古学的与艺术的三种立场,认为近代学人对于文物价值的认知探讨方面未能达成一致观点,影响至今^[11];黄厚明的《现代艺术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古物学》,则考察了文物由赏玩之物到学术材料的时代背景,认为近代是中国传统古物学向考古学过渡的特殊时期^[12]。

近代文物观念发生急剧变迁的一个表征就是,相关指代“文物”的概念术语多出,有“古器”、“古器物”、“金石”、“古董”、“古玩”及“古物”等数十个之多,对这些概念术语内涵、范畴的异同比较研究是深入探讨文物观念变迁的基本工作。近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乔梁的《相关指代“文物”概念词汇的出现与变化试析》^[13]、李晓东的《民国时期的“古迹”“古物”与“文物”概念述评》^[14]、霍楠的《文物、参考品和资料概念问题》^[15]等,认为作为学术术语,“文物”概念的内涵在近代变化较大;郑子良的《“古物”概念之辨析》认为“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古物”概念^[16];曹兵武的《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观念变迁的历史检讨》,则重点从考古学史角度考察了“古代遗存”的概念,认为“文物”概念应包涵其中^[17];朱嫦巧的《文物——一个带有时间维度的文化认同物》,系统探讨了“文物”概念在中国生成的特殊语境,认为近代西学输入后,改变了国人看待与对待文物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文物价值论述的重点从“文”转到了“物”,研究取向向西方模式转变,并成为社会发展、传统与现代争论的焦点^[18]。

二 已有研究存在的明显不足

由以上的学术成果梳理分析可见,已有相关

研究在以下几点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由于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的研究历史时段较长,相关史料散见在考古学史、近代文化史、博物馆史及艺术史等处,考证史料的搜集整理难度大,导致已有研究工作多停留在以概念阐释概念的层面上,基本未展开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而使学界的研究视野多限定于单一学科,缺乏跨学科整理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料的研究意识。

第二,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各种文物观念的分析评价,而观念评价不仅涉及到对传统王朝社会文物与政治合法性、神圣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涉及到对传统文人阶层秘藏私赏文物模式的研究,同时进一步关涉到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探讨等。突破物质性层面的文物,其本身储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信息,对文物诸多信息及价值的认知难度较大。如何在史实分析基础上给予不同文物观念恰当的学术评价,不仅需要有一定抽丝剥茧的学术耐力,同时需要具备对史料的敏锐洞察力。目前已有研究层次还较低,多先入为主地用既定“文物”概念术语勾连史事,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无法深入透视引起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政治、文化及学术等时代因素。因此,不但缺乏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异同比较研究成果,同时缺乏中西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西方古物观念对中国文物观念的影响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关照。

第三,近代是欧美古物观念东渐、本土文物学术研究思维开始转变,东西古今学术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一个历史时段。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语境下,使还原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面相的研究充满了挑战。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缺乏突破文物物质性,深入其作为文化载体观念层面的历史考察成果。

有鉴于此,打破单一学科所限的研究困境,采取考古学史、近代文化史、博物馆史及艺术史等多学科协作研究,从文物的话语层面,完整呈现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复杂历史面相的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很大的学术拓展空间。

三 重新研究的构想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重新研究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进行长时段的连续学术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不仅要利用近代文物收藏、保存、管理法规等档案文件及近代学人文集、回忆录等史料,深入、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的变迁历程,同时也要关注文物观念变迁背后深层的近代政治、文化及学术等时代因素的探讨,尤其是与文物观念变迁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新史学、艺术史及博物馆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深入透视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史提供特殊的视角和途径,深化学界对文物价值的全面认知。

基于以上学术追求,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需重点考虑以下四项内容。

第一,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即以时间为序,从学术层面考证“文物”概念的历史变迁。概念是观念的最直接表达,概念的严格考证是厘清观念异同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概念素来缺乏严格的边框四至,相互指代随意性大。“文物”一词虽出现时间较早,但在近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文物”概念的直接表述,使该概念的内涵、外延均处于模糊状态,近代可与“文物”概念相互指代的名词达数十个之多,概念的混乱成为诸多文物观念争端的起因。民国后,伴随国民政府《古物保存法》的出台,学界曾经尝试从学理和法理层面对“文物”概念进行界定,拟定的有关文物种类、范围的文件先后发行。以相关史料、文件和档案为基础,重新梳理中国“文物”概念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重点考证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性的“文物”概念,从而厘清中国“文物”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发展演变,同时探讨各阶段影响“文物”概念变化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及学术语境。

第二,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主要从中西文化交流的横向层面,探讨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西学因素。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传入是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产生的文化土壤、学术背景等不同,欧美近代古物观念与中国本土文物观念的差异十分明显。与中国古物学未能直接转变为近代考古学不同,欧美近代古物观念形成后直接催生了欧美近代考古学。而欧美近代考古学形成后,其古物研究经历了17、18世纪以含有艺术价值文物研究为重点到19世纪泛化为一切文物研究的变化。受欧美近代考古学观念及清末古物大发现的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范畴开始迅速扩大,而新的服务于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对地下材料史料价值的强调,却使文物丰富的艺术价值研究逐渐被忽略。传统文人以审美为取向的古物玩

赏研究,甚至一度遭到考古学的抨击,这种学术倾向至今仍有存在。

第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主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全面探讨引发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的古今、中西矛盾并存的特殊语境。近代中国文物观念的变迁始终是在古今、中西两对矛盾的交相杂糅下进行的,古今、中西两对矛盾的交相影响,决定了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内容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从历史维度审视,文物在中国传统王朝社会被赋予更多政治层面的话语,由早期自发性搜集的简单纪念品,到充满好奇性的珍奇品,演进到王权国家后的富有政治含义的国之重器,文物具有了特殊的政治符号意义;从学术层面看,文物经历了从宋代金石学证经补史的考据材料到考古学学术原料的演进,从未缺乏自觉的学术追求。进入近代,由于时代主题的急变,文物先后又与国粹、国故和国学产生密切联系,进而成为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特殊材料,被新史学纳入研究视野,学术价值一度突显。近代考古学产生后,“考古遗存”概念的提出、田野考古方法的使用,以及博物馆场域文物公藏观念的传播等,使传统的文物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经济层面的“古董”商品,文人精神层面的情感寄托载体,使文物的内涵价值更加丰富和复杂。通过在古今中西时代大变局背景下,对各种导致文物面相变化的语境的考察,重新探讨带动文物观念变迁的政治、文化、学术等因素。重点探讨在新史学重构中华国族文化的学术目标下,新文物观念形成、传统文物观念逐渐变化或消融的复杂语境。

第四,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即在历史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基础上,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重点探析不同文物观念之间的话语纠葛,以及不同文物观念在变迁历程中的实力消长。作为传统文化的特殊载体,文物蕴涵的信息十分丰富,对文物涵义的不同释读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态度。近代中国有一定影响的典型文物观念主要有:国之重器观念^[19]、金石学考据观念^[20]、古董观念^[21]及考古学学术原料观念^[22]等。各种文物观念寓意的重点明显不同,国之重器观念代表着传统王朝政治神圣性和合法性的宣示。在近代政权变动频繁的背景下,各种政权对文物拥有、保管事宜的关注与该观念的影响关系密切。金石学考据观念自宋代形成后,至清代一度发展成为有着重要影响的一种学术观念。进入近代,随着考

古学观念的产生,金石学因狭窄的文物研究范围和有限的研究手段受到新派考古学者的否定,其考据观念影响逐渐减弱。而在新史学学术影响下,近代考古学学术原料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和认可,并迅速成为主导性的文物观念。而古董观念是在晚明商品经济萌芽后,随着文物商业色彩逐渐浓厚而形成的又一种文物观念。近代后,古董观念虽遭到学界的猛烈批评,但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古董买卖、走私活动依然猖獗,又成为影响文物价值、功用判断的巨大潜流意识。

以上四项内容的重新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已有关于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之不足,同时可以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 [1] 黄海烈:《古董与国粹:民国初年国人的考古学观念》,葛志毅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 [2] 查晓英:《保护“学问的原料”:由1923年新郑铜器发现所见中国考古学之萌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
- [3] 王恩田:《王献唐与新型金石学》,《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3期。
- [4] 李飞:《由集新到集旧: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一个演进趋向》,《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 [5] 吴淑瑛:《博物馆展览与国族、文化的想像——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1936)”为例的观察》,《近代中国》1994年第157期。
- [6] 林伯欣:《“国宝”之旅:灾难记忆、帝国想像与故宫博物院》,《中外文学》2002年第9期。
- [7]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8] [美]珍妮特·埃利奥特、沈大为著,潘利侠等译:《中国皇家收藏传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 [9] 徐婉玲:《记忆与认同:故宫博物院1925—1949》,中国

艺术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 [10] 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 [11] 徐清:《清末民国时期关于“金石学”概念的三种阐释立场》,《美术观察》2013年第11期。
- [12] 黄厚明:《现代艺术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古物学》,《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4期。
- [13] 乔梁:《相关指代“文物”概念词汇的出现与变化试析》,《文物春秋》2011年第2期。
- [14] 李晓东:《民国时期的“古迹”“古物”与“文物”概念述评》,《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 [15] 霍楠:《文物、参考品和资料概念问题》,北京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藏品保管学术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
- [16] 郑子良:《“古物”概念之辨析》,《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 [17] 曹兵武:《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观念变迁的历史检讨》,《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 [18] 朱嫦巧:《文物——一个带有时间维度的文化认同物》,《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
- [19] 该观念的形成较早,商周时期已将皇室、贵族宗庙中收藏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其他前代的遗物称之为“名器重宝”,此后逐渐成为一种文物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 [20] 学界普遍认为金石学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对著录和文字等资料的考据,具有明显的证经补史倾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金石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21] 明中后期文物进入市场后,商业色彩浓厚,经济价值突显,遂形成古董观念,但因阻碍近代考古学观念的传播,成为抨击的主要对象。李济:《李济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
- [22] 最早明确提出文物为学术原料观念的是傅斯年,他认为考古学的任务就是发现文物,为学问提供原料。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1928年。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Wenwu*

XU Ling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Studies over the recent year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wenwu* (cultural relic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concept, the changes of the value recognition over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rm. These studies all adopted the single-disci-

plinary approach with the only concer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but failed to notice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is history.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o take a re-investigation on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conceptual changes of *wenwu* with special focus cast on the definition chang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relics in mod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nd its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in China, the social contexts of these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es with the aim to show the multi-facet conceptual nature of *wenwu* as both a material form and a cultural symbol so as to enrich the field.

Key words: modern China; concept of *wenwu*;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ultidisciplinary; ancient objects; modern culture

江苏省保管专委会2015年年会在江宁召开

2015年11月12—13日,“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博物馆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成功举办。会议由保管专委会主办,常州博物馆和江宁区博物馆承办,来自省内23文博单位、4家团体荣誉会员的57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及研讨会。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刘文涛,江宁区博物馆副馆长夏云,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于征等领导 and 嘉宾出席会议。大会由保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博物院典藏部主任田名利主持,夏云馆长代表江宁区博物馆致欢迎辞,保管专委会主任委员、常州博物馆馆长林健向大会作专委会年度工作报告。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博物馆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是江苏博物馆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13年初,目前挂靠单位是常州博物馆。专委会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各个博物馆保管部之间、为博物馆与企业之间架起沟通桥梁,促进业务交流,同时积极组织相关业务培训,助推我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专业领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对于预防性保护工作愈加重视,抢救性保护已经朝着更为科学的预防性保护工作转变。江苏省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走在全国的前列,已经开展和正在筹备预防性保护

项目的博物馆数量较多。保管专委会把推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为加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提高科技保护水平,专委会举办了此次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专题研讨会。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萍女士,为会员们作了《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的专题讲座,她强调了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具体介绍了预防性保护开展的主要技术内容。之后的交流发言阶段,国内文博领域的专家们又围绕环境监测、环境控制、空气净化、微环境调控等方面作了研讨和发言。除了理论学习,还组织会员们实地考察江宁区博物馆预防性保护项目的实施情况。

通过此次会议,使各家博物馆更全面地认识到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更清晰地了解了这项工作所涉及到的相关技术要求和现有设施设备情况,有助于各馆个性方案的制度,预防性保护工作开展也将更有效、科学。

另外,在年会期间还召开了保管专委会2015年度的理事会议。常委们交流了可移动普查工作的心得体会、艰辛与困惑,探讨了藏品信息化管理和预防性保护工作的经验,并商讨了明年的工作思路。

(常州博物馆 朱 敏)